



遵义会议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主 编 程恩富 陈厚义 副主编 金民卿 范方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遵义会议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主 编 程恩富 陈厚义 副主编 金民卿 范方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程恩富, 陈厚义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004 - 9756 - 1

I. ①遵… II. ①程…②陈… III. ①遵义会议(1935) —
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D220 - 53②D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4625 号

责任编辑 易小放
责任校对 徐幼玲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87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75 周年,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程恩富 (1)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金龙 (9)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维度	黄晓波 (21)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历史价值	
——一种基于现代性焦虑的哲学反思	田鹏颖 (30)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程与特点	陆水明 (43)
试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国化进程的阶段性	
特点	魏忠明 孙厚权 (53)
有重点分层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谭劲松 (60)
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重要前提	金民卿 (69)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脉	许玉乾 (7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源	柳国庆 (86)
从公共性与阶级性的结合点出发来理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励东升 李 桦 (96)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若干问题	张 宇 (106)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杜人淮 (131)
发展主义的反思与超越: 科学发展观理论价值再探讨	田启波 (142)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就业思想探析	陈 跃 (159)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卢继元 (171)
邓小平效率、公平、和谐社会思想研究	王婉玲 (181)
透视我国高房价: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范方志 周 剑 (189)
中国共产党是优秀传统道德的弘扬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苏振芳 (198)
网络文化促进党的执政能力的现实生命力考察	吴克明 (209)

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中华文明传承中的伟大

创举	高旭红 王俊拴	(223)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辩证发展	朱人求	(232)
黎平会议的历史地位及其现实意义	曾 羽 杨文富	(241)

附录

致辞一	陈厚义	(257)
致辞二	孔令中	(260)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64)
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综述		(266)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75 周年,大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程恩富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75年前,具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75年后的今天,第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选择在贵州召开,围绕“遵义会议75周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展开研讨,这很有意义。我很高兴参加这个会议,并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依附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

由于敌人的猖狂进攻以及“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惨痛失败。1934年10月下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漫漫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红军在突围过程中遭遇重大挫折,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在此情况下,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

^{*} 此文为作者在第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上的主题报告。

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标明了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

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次提到这次会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高度评价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曲折走向顺利、从艰辛探索走向逐步成熟的历史关节点。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发进取的光辉历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产生、发展、丰富和不断完善，是一个长期而开放的历史过程。遵义会议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这次会议促进了党的成熟，实现了党的独立自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破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打破了“唯书论”、“唯共产国际论”的迷信思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从理论主体、思想方法等不同层面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虽然也有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

这次会议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其宝贵的优良传统：开始在全党范围内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开始形成一个成熟、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核心，保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优良传统对于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至关重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遵义会议以及其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雄辩地证明:什么时候能够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就必然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不能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只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损失。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富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征,科学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推进并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引领中国人民开始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充分准备。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蒙受了巨大损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进程也几乎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今天,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就是要坚持不懈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以不断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从历时态的逻辑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三个逻辑递进环节:一是学习与坚持,即全面准确地学习、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也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结合与转化，即在学习与坚持的基础上，把它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在结合过程中实现理论风格的空间转换，理论应用域的时间转换。三是突破与创新，即在结合运用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不断提出新的理论体系、概念论断、对策思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个逻辑环节的结果就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

从共时态逻辑展开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注重中华民族的特殊性，要研究民族的现实需要，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特殊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民族特点。只有同中国具体民族特性相结合，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只有把握时代问题，认清世情，才能确定党和人民所处的时代地位和历史方位，才能把握中国发展的时代命脉和历史趋势，才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通过什么样途径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问题。第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定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掌握群众，为群众所接受，这就要走大众化的道路。要大众化，就必须通俗化，让群众看得懂、用得上，要运用通俗易懂、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理论从理论家的书本上、从思想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真正掌握群众，转变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不懈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使命，也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不负历史重托，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为统领，着眼于解放思想，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着眼于实践，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着眼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坚决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坚决抛弃所谓的“古教条”、“洋教条”、“马教条”、“新教

条”等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发展着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化”,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实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下面,我就中国模式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中国模式的讨论由来已久。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便有国外学者讨论和研究中国模式。80—90 年代,国际范围内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趋于活跃。其间,国外学者多以比较中俄经济转轨视角来探讨中国模式。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开始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现代化道路等视角对中国模式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2004 年 5 月,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更是催生了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一些曾经认为西方经济体系完美无缺的经济学家对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称赞并仿效的中国模式表现出浓厚兴趣。与国外学者的“热炒”相比,中国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模式则显得比较拘谨。以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为契机,国内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随着对中国发展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而持续升温,进入 2010 年以来达到高潮。中央领导十分关心中国模式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要慎提中国模式。有学者认为应以“中国特色”替代中国模式,因为我们的体制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有学者认为应该叫“中国案例”,因“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有学者认为可谈“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不能宣扬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中国一国发展道路,且仍处于发展和完善中,谈中国模式似乎尚早。

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否认中国模式,要理性宣传和发展中国模式。有学者指出,对于否认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的意见,事关我们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尤需通过讨论而澄清。中国模式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丝毫没有自封样板之意;它体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重视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它可供别国借鉴和参考但不能照搬或强加;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有学者指出,没有必要回避中国模式。倘若认为还处于变动之中就没有中国模式,那么只能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而认为只有完全定型的才称之为“模式”,那等于说“模式”必僵化。有学者认为,不承认中国模式的

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漠视。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

我认为，第一，模式和其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莱茵模式”、“东亚模式”等，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现实体现。第二，中国模式并非雷默的发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到过“中国自己的模式”、其他国家也应该有“自己的模式”。江泽民、胡锦涛均多次强调：“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他们提出或者说使用中国模式概念，是瞩目于坚决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也是着眼于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必须坚持“相结合”的道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他们并没有因中国尚没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制度而否认可以使用中国模式。第三，金融危机后中国的优秀表现使世界的反思有了客观存在的参照系，所以，中国模式、中国崛起在世界范围内被热议。《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几家媒体进行的“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专题调查，比较可信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中国模式的认可，在此情况下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不仅不会冲淡“中国特色”，还会给“中国特色”添彩增色。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中国道路与经验作出系统深入的解读，对于在更理性、较深入的意义上继续开展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以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我想着重谈谈中国模式的实质和内涵问题。

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基于静态的社会制度、动态的转轨转型以及经济发展等视角对中国模式进行的解读，有真知灼见，有以偏赅全，也难以排除居心叵测的误读。通过对诸多观点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把握中国模式的实质和内涵。

我认为，不讲社会主义，不划清一些重大界限，如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等，就无法深入把握中国模式的实质。一些观点就是因有意无意地淡忘或不讲社会主义，从而使自己对中国模式的解读沦落为对中国现状既片面且表象的描述，自然也就既无法把握中国模式的“中国特色”，也无法正确回答中国模式“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一深刻理解中国模式无法逃避的重大问题。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一言以蔽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对中国模式实质及其内涵所作的最精炼的概括。因这一概括既讲了社会主义,也深刻把握了中国模式的民族性时代性,还维护了“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同时它还回答了中国模式“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因此,目前热议的中国模式的实质和内涵,只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当代实现形式而已。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其经验即党的十七大所总结概括并被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十个结合”。中国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中国个性和民族色彩;中国模式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和中国的时代精神与进步内容,具有鲜明的当代性,也因之具有历史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会定格在当代内涵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模式也一定会与时俱进地汲取时代的新精神和进步内容。

众多学者阐述了中国模式诸多方面的特征。我认为,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也是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特征的基本出发点。

首先,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形成了“四主型经济制度”特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资本技术同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经济交往关系。其次,中国模式在政治建设上形成了“三者统一、四层制度”的架构。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再次,中国模式在文化建设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两个主体”的格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在构建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大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文化建设形成“公有制为主体、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两主体格局。又次，中国模式在社会建设上形成了“一个格局、三个互动、四个机制”的体制。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我认为，没有完美无缺的发展模式，任何模式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挑战。中国模式当前面临着以下挑战，如指导思想上，一些人妖魔化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新自由主义；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过大，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外经济依存度过高造成经济波动性较高；文化赤字较高，文化“走出去”的步伐缓慢，文化软实力有待加强；社会群体事件不断增加等。但我相信，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大胆探索、实践、创造，我们就一定能够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就一定能使中国模式在保持中国社会主义不变质的情况下，呈现与自己更高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特征。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金龙

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权益、民族感情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政治原则与社会心理。有学者提出：“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的中国，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运动，或者特定的思想流派，而是到处弥漫的思想氛围。”^①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学术界研究较多，而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关系，学术界论及较少。事实上，民族主义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准备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实现了对民族主义的改造，赋予民族主义新的特点。

一 民族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

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民族主义兴起在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绎在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准备条件。

1. 民族主义促进中华民族觉醒，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营造社会氛围

近代中国是一个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掠夺、凌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日渐形成。民族主义一经形成，促使国人进一步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危机中觉醒，在觉醒后奋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

^① 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9 页。

一时间,各种“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种救国“方案”、“主张”此消彼长,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中国的。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我们应“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①。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救世方案、救世学说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动力,来源于民族主义的感召与刺激。

2. 民族主义强化民族自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心理基础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深刻反省民族特性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民族自信,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凝聚力,认识到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②这种民族自信,正是民族主义的表达与流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富有挑战、需要创造和智慧、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实践,民族主义所释放的民族自信与对中华民族创造力、文明发展程度的确认,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心理基础。

3. 民族主义促进中国知识分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主体条件

经受民族主义熏陶与滋润,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生成了深沉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开始探索中国出路,寻找救世良方,进而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自身从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1921年1月,周恩来在致陈式周的信中就表示:赴欧的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③周恩来等先进知识分子赴欧

^①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398页。

^② 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页。

^③ 参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4页。

勤工俭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学习、借鉴西方，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民族主义是促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成长的精神力量，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担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使命的思想纽带。

4. 民族主义强化民族本位意识，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

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为主体、为中心的意识，这种民族本位意识，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日渐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指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①。这就初步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而应结合中国国情有选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1924年，李大钊又说，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②。这里已经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在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时，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③可以说，民族本位意识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共产国际的干扰，独立开辟中国革命的道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中共明确表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④申明革命由“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既符合革命发生的规律，也是民族本位意识的显露。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头，民族本位意识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

因此，民族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社会环境、奠定心理基础、

①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页。

③ 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版，第201页。

准备主体力量，也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在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与土壤时，不能忽视民族主义的因素和影响。

二 民族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资源

民族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底蕴，而且直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参照、思想素材与思想资源。

1. 民族主义与反帝目标的确立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反抗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1901年10月，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还说，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首先是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滋生的。

反帝是近代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之一，反帝目标的确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一纲领的制定固然得到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但也是民族主义反帝端绪的延续，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反帝的呼声为中共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起了铺垫作用。同时，中共在表达反帝主张、推进反帝实践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的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现。其一，明确认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尽管1924年国民党一大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受到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影响，但一经作出新的解释，中共明确表示认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李大钊看来：“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经了这番新解释，其意义也更新而切当了。”^②毛泽东也认为，“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③，“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④。抗日战

① 《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6，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0、22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

④ 同上书，第16页。